

互文视野中的

| 女性 | 诗歌



张晓红 著

HUWENSHIYE
Zhong de nüxing shige

本书由深圳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放眼当代中国，女诗人灿若繁星

诗歌作品有如雨后春笋

“女性诗歌”这一批评话语也应运而生

笔者深受法国社会学家福柯和布迪厄的启发

将“话语”定义为一种语言生产、接受、

流通、消费的模式，

涉及由作家、普通读者、批评家、

出版社、文学体制等环节组成的整个文学场。



互文视野中的
| 女性 |
诗歌

张晓红 著

HUWENSHIYE
Zhong de nüxing shige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互文视野中的女性诗歌 / 张晓红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12

ISBN 978-7-5633-7928-6

I. 互… II. 张… III. 妇女文学—诗歌—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4241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金考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广西南宁市友爱南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30001)

开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 19.5 字数: 350 千字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4 000 册 定价: 4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荷兰莱顿大学 柯 雷

当代中国女性诗歌,曾经、现在都以其独特的审美意义和先锋性而获得学界的重视,无论是在中国现代文学、比较文学还是海外汉学的研究中,它都是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因此,对当代中国女性诗歌的研究如何在已有的基础上获得充分的整理和新的观照,并尽量克服以往研究过程中有意无意的误写和误读,是文学研究者们刻不容缓的工作。张晓红博士的 *The Invention of a Discourse: Women's Poetry from Contemporary China* (荷兰莱顿大学 CNWS 出版社 2004 年版)是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女性诗歌的英文专著,在广阔的学术背景下审视了一系列“周边”话语。该书在文学理论、性别研究、中外女性文学史等领域中开辟出一方新天地,同时避免了让研究对象个性化的声音淹没在理论术语和历史潮流之中。

某些文本在一些个体当中偶然走红的机制,凸显了个性化声音,而巧合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某一民族诗学的趋向。美国诗人西维利亚·普拉斯及其在中国的接受即可为一例。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拒绝哗众取宠的诗歌文本并不多见。在官方文艺圈之外,这些稀罕的另类文本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力和接受效应。放眼中外文学史,由于机缘巧合而导致个体写作者成功和某种诗学形成的先例屡见不鲜。当学者们试图解释我们周围的世界时,往往会小视偶然性之类的概念。然而,艺术品先由我们创造出来,而后又被我们考量。当我们致力于辨别艺术品永远变化着的维度时,一旦发现偶然性,就有理由承认其存在的合理性。当然,归根结底,机缘巧合只能起到催化作用。文本的价值和意义最终只能用文学标准和学术标准加以评判。

张晓红博士在荷兰莱顿大学留学期间,接受过严格的文学理论方法的

学术训练。她长期关注中国当代女性诗歌的创作实践与理论研究。她的多篇论文在国际权威的比较文学和汉学期刊上发表,其研究成果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张晓红博士对当代中国女性诗歌的研究,立足中国自身的语境,批判性地运用互文性和女性主义理论,从文学生产和社会性别两方面入手探讨女性诗歌的实质。她以大量的、完整的研究文献为基础,在研究中大胆地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将中国当代女性诗歌与更为宽广的、超越时空局限的文学文本联系起来,表现了敏锐的理论意识和相当高的专业水平。她按照主题分类有条不紊地从事个案研究,细致地分析了翟永明、伊蕾、陆忆敏、王小妮、海男、唐亚平、张真等一大批优秀女诗人的诗歌作品,用细腻流畅的语言呈现了诗歌文本的美和意义。

阅读张晓红博士新的研究成果《互文视野中的女性诗歌》,增强了我对中国学界水准和国际化程度的信心。在诗歌研究不景气和感性批评泛滥的今天,张晓红博士等学者的努力,对当下中国诗歌的研究、西方诗歌与中国诗歌的比较研究、中国女性诗歌的研究将会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目 录

序	1
绪论	1
第一章 历史语境中的中国女性诗歌	8
第一节 术语和概念的歧义 /9	
第二节 当代主要潮流 /15	
第三节 区别性文本特征 /26	
第四节 女性文学传统 /28	
第五节 历史大观园 /31	
第二章 作为一种阅读策略的互文理论	42
第一节 互文现象掠影 /43	
第二节 互文性概念 /54	
第三节 应用型互文性 /58	
第四节 分析框架 /66	
第三章 走向共同的中国女性诗学	74
第一节 有关语言和性征的女性主义理论 /75	
第二节 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接受 /84	
第三节 走向中国女性诗学 /86	
第四章 女性身体	106
第一节 传统母题 /107	
第二节 当代重写 /109	

第三节	闯入禁区	/121
第四节	女性创造力的象征:血和分娩	/127

第五章 镜子与写作 136

第一节	传统的镜子意象	/137
第二节	跨文化的镜像作用	/146
第三节	照镜与镜鉴	/154

第六章 她们自己的黑夜 165

第一节	黑夜意识	/166
第二节	黑色、女性性欲和主体身份	/172
第三节	历史记忆	/185

第七章 死亡的圣地 198

第一节	文坛自杀事件	/199
第二节	隐喻性死亡	/203
第三节	戏剧化的生命叙事	/217
第四节	死亡乃创造力之源	/225

第八章 沉重的飞翔 233

第一节	女性身份和飞翔	/234
第二节	飞行生物的生存境遇	/245
第三节	小鸟和创造力	/252

结论 258

主要参考文献 263

附录一 走进翟永明的诗歌世界 271

附录二 南行深圳:王小妮采访笔录 280

附录三 诗里诗外:与海男谈文学创作和 性别话语 291

后记 303



绪论

放眼当代中国,女诗人灿若繁星,诗歌作品有如雨后春笋。“女性诗歌”这一批评话语也应运而生。笔者受到法国社会学家福柯和布迪厄的启发,将“话语”定义为一种语言生产、接受、流通和消费的模式,涉及由作家、普通读者、批评家、出版社和文学体制等环节组成的整个文学场。^①从社会学意义上讲,话语产生权力,权力加固话语,两者的关系密不可分。本书避开话语与权力的纠葛,着重探讨当代中国女诗人和批评家如何共同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话语方式。

关于女性诗歌的定义尚无公论。粗略地看,女性诗歌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吕进认为,广义的女性诗歌囊括不同地域、不同时代、不同写作风格的所有女性诗人的作品。^②唐晓渡、陈旭光、李震等诗评家则采用女性主义立场和思想方法,把狭义的女性诗歌定义为“自白”味十足的女性作品。^③根据后一种定义,如果某位女诗人的诗作风格传统保守或者持中性立场,那么她就算不上“女性诗人”,而其诗作亦不属于“女性诗歌”。这样看来,林子的著名组诗《给他》就很难被归入此类,而朦胧诗人舒婷的作品似乎也不“入流”,因为其诗作抒情味浓、忧郁伤感、阴柔婉约,缺少“女性主义意识”。

笔者认为,女性诗歌的话语建构是对“文革”时期阶级话语的反动,折射出对女性性别和身份重新萌发的兴趣。追本溯源,女性诗歌最初是由男性批评家所界定、所操纵、所炒作的话语,其积极意义在于认同性别化写作,为

① Bourdieu Pierre, *Flaubert's Point of View*. In *Critical Inquiry* 14 (1988), pp. 539—563.

② 吕进:《女性诗歌的三种文本》,载《诗探索》,140页,1999年第36期。

③ 唐晓渡:《女性诗歌:从黑夜到白昼——读翟永明的组诗〈女人〉》,载《诗刊》,58页,1987年总第213期;陈旭光:《诗学:理论与批评》,120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李震:《王小妮:“活着”及其方式》,载《作家》,42页,1996年总第332期。

独立地研究女性作品提供了某种理论上的支持；其负面意义则表现为各种男性偏见。一些男性批评家摆出道德家的姿态，批评女诗人“自恋”、“自虐”、“丑恶”、“变态”、“疯狂”、“作秀”。^①同时，他们也从审美的角度贬低女诗人，认为她们的写作呈公式化和格式化趋势，缺乏表达的深度和广度，缺乏客观性和历史感，与男性诗歌不可同日而语。^②然而，从接受的角度来看，利用非文学标准来判断文学文本价值的做法缺乏有效性。个体的文学经验不等同于其真实的生活经验。真实或非真实的日常生活经验，于文学作品的真实性无增无减。武断的道德标准不适于文学批评，因为它对女性诗歌造成了严重的误读和伤害。女性诗歌不能也不应该仅仅以性别为参照点，使得道德标准凌驾于文学标准之上。任何脱离文学标准的判断都会导致简单粗暴的介入性阅读。这一方面阻碍审美经验的发挥，另一方面不利于挖掘文本的审美潜质。

此外，当前的批评话语还存在着两大“盲区”。其一，它忽略了群体话语和个体诗学的互动关系，迄今为止，尚未见评论家和学者系统地研究女诗人共同的经验、主题、诗歌语言和技巧，也很少有人关注女性诗歌与国内外文学环境的交叉关系；它还忽略了大量的个性化元素，对群体话语里的个性化意象、主题和诗歌语言不加理会。其二，它注意到了女诗人某些共同的语义和文体偏好，但未深入地探讨这些文本特征出现的原因和方式。换言之，它未能透视整个话语的形成机制。

在本书的理论框架内，女性诗歌指的是：女诗人用一种明晰的言说方式表现与社会性别有关的主题、经验和心理的诗歌作品。笔者对主观臆断、轻率鲁莽的诗歌批评提出质疑，借助互文性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重新思考文学创作和女性身份的关联。本书重点研究的问题如下：

1. 当代中国女性诗歌在批评话语中是如何被定义的？当前的批评话语是否客观公正地反映了该研究领域的主要趋势？
2. 女性诗歌有何区别性特征？它何以在中国当代先锋诗歌的大框架内成为一个独立的批评话语？它与更早的中国女性作品有何联系？

^① 陈旭光：《诗学：理论与批评》，126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李震：《王小妮：“活着”及其方式》，载《作家》，42—43页，1996年总第332期。

^② 周瓊：《女性诗歌：“误解小词典”》，载《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19页，2002年第2期。

3. 女性身份与特定的诗歌语言类别之间的关系如何? 女诗人如何言说其独特的性别经验?

4. 女诗人从本土文学和外国文学中选择了什么样的楷模? 她们如何协调借鉴与创新的关系? 互文联系如何作用于中国女性诗歌话语的建构过程?

笔者借助文本和互文分析来辨析女性个体创作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意象、语言用法和形式特征。与此同时,借鉴女性主义理论来分析女诗人是如何把性别经验转化为语言的。在具体的语境中,笔者不避讳历史的、传记式的、社会文化的等多种视点,从而不断补充和丰富上述的文本分析、互文理论和女性主义批评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全书的主体部分由八章构成:第一章至第三章构筑本书的理论框架,分别介绍历史语境中的中国女性诗歌、作为阅读策略的互文性以及女性主义理论;第四章至第八章分五个专题就当代中国女性诗歌进行个案分析,挖掘其间意蕴丰富的互文性。附录部分包括对三位重要的当代中国女诗人——翟永明、王小妮、海男的访谈,把田野调查和阅读经验有机结合起来,拓宽诗歌研究的广度。

第一章阐述历史语境中的中国女性诗歌话语,集中讨论关于女性诗歌的定义之争、重要的当代诗潮和事件以及区别性主题特征等问题。笔者与目前的批评话语进行商榷,剖析其中的盲点和偏见,梳理女性文学传统,揭示其中的连续性和断裂因素,力图书写一部较为公允的现代女性诗歌史。

第二章以中国语境为依托,阐述互文性概念的内涵和外延。1966年法国后结构主义理论家、符号学家、心理学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发明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一词,已成为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轴心概念之一。互文性概念貌似玄妙高深,实际上不过是对常识性知识的理论提炼。根据互文性理论,绝对的原创性不复存在,封闭自足的文本无处可寻,一部文学作品总是和别的文学或非文学文本产生关联。互文性概念暗示着,文本的真实性和原创性是相对的,文本之间没有固定而清晰的等差。一个文本就是一个巨大的关系网,它掺杂着作者本人和他人的经验、记忆和想象,与前人的前文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什么文本在本质上优于其他文本。一个文本仅仅是一种可能的文字表达形式。一个文本可能具有的全部价值,是一种个体的赋意行为,是个体在特定语境中基于特定标准和具体条件而作出的判断。个体对某个文本的偏爱,取决于他或她的性情、经

验、性别、阶级和年龄等因素。个体读者自主地决定某些文本如何以及为何能取得成功。

尽管对互文性理论的褒贬不一,但是克里斯蒂娃的“引语马赛克”(mosaic of quotations)、巴特的“回音室”(echo chamber)、布鲁姆的“互文本”(intertext)、热奈特的“隐文”(palimpsest)等说法却在某种程度上达成共识。笔者认为,互文理论与传统的影响和考源研究有两个重要的不同点:其一,传统的影响研究关注的是一对一的影响,突出影响者的权威,忽略被影响者的创造性接受;其二,互文性理论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它把一切文学的、文化的、书面的、口头的文本都视作实际的或潜在的互文本,这些文本一方面与或明或暗、或隐或显、或在场或缺失的前文本构成一个密密麻麻的互文网络,另一方面又可能成为无数后来文本的前文本。

笔者主要借鉴麦克·里法特尔(Michael Riffaterre)的“社会方言”(socioclect)和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关于“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的表述。在《诗歌符号学》一书中,里法特尔强调“社会方言”包含所有的标准文化知识,诗歌生产实际上是对“社会方言”的创造性重写。^①而布鲁姆则在《影响的焦虑》一书中介绍了一套新的互文运作机制:在西方文学传统里,诗歌创作的原动力来自像莎士比亚和弥尔顿这样的伟大诗人,任何后来者都会经受影响和原创的双重焦虑,形同“恋母情结”患者俄狄浦斯,处心积虑地“谋害”父亲诗人、颠覆父亲诗人的权威,但却因为远远滞后而无法达成夙愿。^②在布鲁姆看来,一切诗歌创作不过是对伟大的父亲诗人的“误读”(misreading)。尽管布鲁姆所界定的西方诗歌传统只有清一色的男诗人,但他把被巴特判了“死刑”的作家和诗人重新放到互文的风景线上,从而为女性主义批评家(如肖瓦尔特、吉尔伯特、格巴、克洛德妮等)重建“另一种传统”并提出“作家身份和影响的双重焦虑”之类的女性主义互文性理论模式提供了反面参照。^③笔者结合里法特尔和布鲁姆的互文性理论,从文

① Riffaterre Michael, *Semiotics of Poetry*, Bloomington, IN and Lond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30.

② Bloom Harold,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11.

③ Kolodny Annette, *A Map for Rereading: Gender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Literary Texts*. In: Showalter, 1986, p. 46.

学生产和社会性别两方面入手探讨当代中国女性诗歌的实质。

当代中国女性诗歌与大量口述的、书面的前文本形成丰富的历时关系。同时,它也呈现了同时代女诗人之间、男女诗人之间丰富的互文关系。笔者首先分析显性互文性与隐性互文性之间的差别。^① 显性互文性和隐性互文性是两种不同的互文表征方式。在特定的文本中,显性互文性相对明显、具体、一目了然。而隐性互文性则较隐晦,识辨起来有一定难度,因而需要创造性阅读技巧。不过,两者之间的界线模糊不清,不可能决然地划清界限。相比较而言,已察互文性和未察互文性之间的分界较易于把握,其原因有两点:其一,阐释活动以读者为导向,重视个体读者之间的差异;其二,强调互文性是文本性的有机组成部分,存在着显性或隐性、已察或未察等多种互文形式。在某些场合,笔者的互文分析基于主题上的相互观照而非有根有据的参照。此外,笔者还注意到互文现象的时空性,力求建构一个连贯一致的、可操作的分析框架。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构成本书的另一大理论支柱。以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家剥夺了作者的地位,将写作和阅读视为自足的产物。女性主义批评家对匿名作者或作者的“死亡”表示强烈不满,她们大唱反调,坚信写作和阅读具有性别意义,与性别化主体的经验不弃不离。女性主义批评家着眼于性别身份与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重视性别经验转化成语言的过程。

第三章审视女性主义理论的两大分支——英美和法国女性主义理论,观照其在中国的接受,为研究中国诗人和评论家如何联手建构中国女性诗学打开方便之门。在第三章中,笔者勾勒群体话语和个体诗学之间的互动关系。笔者认为,当代中国女诗人进行言说和诉求,目的是为了在语言 and 意识形态的樊篱中获得她们自己的一方天地。

当代中国涌现出一大批女诗人。在关注新诗人、新诗作和新事件的同时,笔者重点研究了翟永明(成都)、伊蕾(天津)、王小妮(辽宁人,现居深圳)、张真(上海人,现旅居美国)、陆忆敏(上海)、海男(昆明)和唐亚平(四川

^① Worton Michael and Still Judith, eds., *Intertextuality: Theories and Practices*,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45; Plett Heinrich F., ed., *Intertextuality*, Berlin and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1991, p. 3.

互文视野中的女性诗歌

人,现居贵州)。笔者选择研究对象的标准有两条:一是考虑到诗人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二是考虑到诗人所处的地理位置,力求较为全面地反映诗歌创作的现状,不走北京中心主义的诗歌批评道路。主要的研究资料包括15卷本《中国女性诗歌文库》以及翟永明、伊蕾、海男等诗人的个人诗集。

笔者选择90首诗,有的部分引用,有的全文引用,视诗作的长度和立论的需要而定。所选文本风格多变,形式不一,手法各异。就个人喜好而言,笔者特别欣赏大胆的隐喻、起伏多变的诗歌声音、文学双关语、典故、歧义、混杂的语域、推陈出新的社会和政治套语、表现力强的形式特征。笔者推崇翟永明早期激情澎湃的言说方式及其后期所采用的叙事和戏剧技巧。王小妮简洁明丽、平实朴素的语言风格,颇投笔者所好。海男的典故、跳跃式句子结构、语词游戏和寓言,同样可圈可点。

当代中国女性诗歌里散发着悲观厌世和虚无主义情绪,以“黑夜意识”和“死亡情结”为主要表现形式。然而,女诗人不是单纯的悲观主义者;她们时而奋起反击社会和历史强加给女性的不公正待遇,时而沉迷于私人情感和经验,时而放声歌唱生之悦,时而在创造的迷宫里徘徊。女性身体、镜子、黑夜和黑色、死亡和濒死经验以及飞翔等重要主题和意象紧密相连,莫不关乎女性特殊的性别经历和感受。此外,一些形式特征、诗歌语言和技巧也带有女性性别的烙印,如铺天盖地的“我”程式、排比句的大量使用以及突降式文本结构。可以说,上述区别性文本标记源于女诗人特殊的文化历史经验和身体体验,源于本土文学和外国文学的互文联系,源于个体诗人的创造力。

第四章探讨“女性身体”。在不同的文化传统里,作为审查对象的女性身体记载了女性的脆弱和柔美。而当代女诗人将身体作为反抗和颠覆传统价值的阵地,运用“身体写作”的策略进行自我授权。女诗人通过书写身体来探究女性身份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第五章考察感知自我和世界的镜子意象。镜子不仅折射出女性生理和心理上的变化,而且成为女诗人进行自我定位和反思的媒介。女诗人与自身和传统的对话催生了各种镜像效应和互文联系。

第六章揭开一道黑色的文化风景线。黑夜意象被赋予正面和负面的意义,成为女诗人言说其性别意识和主体性的直接渠道。女诗人对黑色和黑夜的青睐导致了纷繁的互文联系。识辨和阐释绞缠的互文现象,是我们理

解女性诗歌里蔓延的“黑夜意识”的关键所在。

第七章讨论死亡情结。女诗人观察、描绘、解读和思索女性的生存境遇,通过想象死亡来表达对生活的厌倦或眷念,并在形而上的层面上考量死亡,把死亡母题变成创作的源泉。

第八章围绕飞翔主题展开。女诗人常常将暧昧的感受移情到小鸟、乌鸦、蝙蝠和蝴蝶等飞行生物上,在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突围和飞翔的渴望。她们欢庆女性身体的飞翔和想象的自由。然而,渴望归渴望,在现实的阻力面前,想象的飞翔难以为继,最后多以沉沦的方式结束。根据张清华的看法,“黑夜”、“飞翔”和“死亡”之类的意象和主题是关于女性身体和女性欲望的隐喻,帮助女诗人开辟出自己的话语空间。^① 这些意象和主题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全部落脚在诗歌创作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这一核心问题上。

^① 张清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324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

第一章

历史语境中的中国女性诗歌

如果女人像男人那样写作,像男人那样生活,或长得像男人那样,那该是多么遗憾的事情!试想世界何其广袤,何其纷繁,两性尚且不够用,我们又岂能要求单性来应对?^①

——弗吉尼亚·伍尔夫

中国当代女性诗歌是个时髦而又充满悖论的话语,它承认女性书写与男性书写之间的差异,并且凸显群体诗学的概念和重要性。针对女性诗歌的范围、性质、内容、形式和意义等问题所引发的争论可谓多矣,而争论本身发端于对“女性”一词的不同理解。由于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一部较为公允的现代女性诗歌史尚有待书写。笔者与当前的批评话语进行商榷,剖析其中的盲点和偏见,梳理女性文学传统,揭示女性诗歌里所蕴含的互文关系。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赶时髦,更不是为了谋划一场意识形态革命,强行把一个支流的、边缘的、陪衬的话语推到中心或前台。笔者的研究旨在重新解读贴在女性诗歌上的种种标签,认真探讨其形式和审美意义,审视该话语的形成机制。

^① Woolf Virginia, (2000), *A Room of One's Own*. London: Penguin, 1928, p. 87.

第一节 术语和概念的歧义

1987年,诗评家唐晓渡在权威的《诗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女性诗歌:从黑夜到白昼”的评论文章,之后女性诗歌作为一种批评话语逐渐形成气候。^①根据他的看法,翟永明的组诗《女人》可谓开山辟地之作,其理论深度和创造性远远超出新文化运动中的女性文学。他所谓的“女性诗歌”专指某一类由女诗人书写的文本,有别于“温柔、细腻、委婉、感伤”的传统诗作。尽管文章篇幅短小,但是却聚焦在一些有争议性的话题上。例如,当代中国女性诗歌该如何定义?哪一种定义更具说服力或更有生命力?中国文学史上是否存在女性写作传统?当代女性诗歌在多大程度上与非中国的文化历史传统有血脉关系?

中国学界目前对女性诗歌的定义仍未能达成共识,这是由于对“女性”的定义标准不一。实际上,关于“女性”一词有着两种相关而又迥异的解释:“女子”和“女子气”。前者属于生理概念,而后者强调文化特征。这样看来,女性诗歌也就具有两种不同的定义。广义上,女性诗歌囊括不同地域、不同时代、不同写作风格的所有女性诗人的作品,但是不包括男诗人写给女性、描写女性或具有女性性别特质的作品。^②狭义上,女性诗歌特指一批女性主义作品,它们往往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记载和反抗男权社会里女性从属于男性的命运。^③

唐晓渡从狭义的女性诗歌出发,将一些女诗人的作品排斥在女性诗歌范畴之外,理由是她们在作品中没有表现出以女性为中心的立场。唐晓渡在2001年2月接受笔者采访时重申,林子的著名组诗《给他》遵循了传统的自我表达模式,因而不能被纳入女性诗歌范畴。类似地,陈旭光在《诗学:理论与批评》一书中推举翟永明、唐亚平、伊蕾、海男为“女性诗歌”的代表人物。陈旭光指出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不一致,在他看来,女性诗歌凸显作

① 唐晓渡:《女性诗歌:从黑夜到白昼——读翟永明的组诗〈女人〉》,载《诗刊》,50、58、59页,1987年总第213期。

② 吕进:《女性诗歌的三种文本》,载《诗探索》,139—147页,1999年第36期。

③ 唐晓渡:《女性诗歌:从黑夜到白昼——读翟永明的组诗〈女人〉》,载《诗刊》,50、58、59页,1987年总第213期;陈旭光:《诗学:理论与批评》,120—135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

者的社会性别意识。按照其分类,舒婷、王小妮、张真被排除在女性诗歌的批评话语之外,大概是因为她们的作品与女性主义意识形态和自白式文风相去甚远。^①而李震区分“前女性诗”、“女性诗”和“后女性诗”的做法,显然参照了狭义“女性诗歌”的界定标准。^②

其他批评家和诗人不赞同女性主义味道过浓的评判标准,敞怀拥抱广义的女性诗歌。翟永明(生于1955年)将女性作品分为三类:“女子气的抒情感伤”、“不加掩饰的女权主义”和“女性文学”。^③2002年9月,当笔者在成都采访翟永明时,诗人解释道:

我觉得它(女性文学)应该是一种比较独立的写作,它可以与性别发生关系,也可以不发生关系,我并不认为它一定要取一个中性的立场。事实上,客观意义上的中性立场也是不存在的。所谓的中性立场只不过是一种加以掩饰的男性立场。中性写作使用的是一套男性标准,实际上仍然是被纳入男性写作的框架中。

翟永明尊重女诗人的自主性,但是她反对所谓的“中性写作”。她认为“女性文学”是性别化的,不过在主题上可以超出性别范畴。诗评家吕进则提出了另一种三分法:“女性主义诗歌”、“女子诗歌”和“超性诗歌”。^④另一位诗评家陈仲义也对“女性诗歌”提出类似的三分法:角色/性别确认、角色/性别强化、无角色/中性在场。^⑤

“女性主义者”或“女性主义”等词在当代中国文学语境中招来反感。而“女子气的”和“女性的”之类的标签反映了不同文化传统里长期存在的男性偏见,对女性书写加以贬损,斥之为小家子气、多愁善感、七零八碎的写作,缺乏表达的深度和广度,缺乏客观性和历史感,无法与男性写作并驾齐驱。正如翟永明、吕进和陈仲义所言,最可取的方向是“女性文学”、“超性诗歌”

① 陈旭光:《诗学:理论与批评》,120—135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

② 李震:《母语诗学纲要》,232页,西安,三秦出版社,2001。

③ 翟永明:《黑夜的意识》,载《磁场与魔方:新诗潮论卷》,吴思敬主编,收入《当代诗歌潮流回顾》(六卷),140—143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④ 吕进:《女性诗歌的三种文本》,载《诗探索》,141页,1999年总第36期。

⑤ 陈仲义:《扇形的展开:中国现代诗学谏论》,212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